

# 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

## ——论冯玉祥在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的思想演变

□ 李朝阳(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073)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在处理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走过了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最后拥蒋抗日的曲折历程。力图实现其发展个人势力与救国救民的双重目标，是一串复杂变化的思想动因。

关键词：冯玉祥；抗日；蒋介石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5)10-0089-04

### 一、反蒋抗日

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派员四处联络，策划共同反蒋，但都无果而终。对旧部无一响应，冯非常失望。1931年7月，他在日记中写到：“恐怕军队中除了一些根本即是好的以外，营长以上的官长，已完全变为大军阀、小军阀、希望军阀、候补军阀之一路人矣。”“我的新路是与旧朋友离开的路，”但到底“如何作法，须细心想想。”“九一八”事变为其进一步思考提供了契机。

“九一八”事变后，出于对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不满，国民党内或明或暗地翻滚着多股反蒋抗日潮流。潮流之一是十九路军势力；之二是原西北军势力；之三是以程潜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部分国民党元老、官吏和军人；之四是孙殿英、杨虎城等北方和西北实力派。反蒋派纷纷借呼吁抗日向蒋介石发起进攻。冯玉祥感到以反蒋抗日为武器，实现发展个人势力和救国救民双重目标的时机降临。他当即指出，要抗日必反蒋，“我以为此时应成立雪耻军以对日人，而同时催贼走开。”他分别致电广州国民政府及熊希龄，申明要抗日，必迫使蒋“停职待罪，国人应否认南京政府。”单在11月17日，他一口气写了十几封信，不遗余力地向各方一再表明，蒋不下野，救亡图存绝难实现。

冯玉祥坚持“反蒋抗日”，代表了当时中国

社会一部分中间阶级的要求：不满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要求抗日，完成民族革命；不满国民党一党专制，要求政治民主化，完成民主革命。由此可见，冯玉祥呼唤反蒋抗日，客观上是在寻找当时民族民主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的道路。当然，此时它的认识并非自觉。其反蒋抗日，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乘机东山再起。同时，他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对日妥协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必然结果，仅认为只要除蒋，就可抗日。

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冯玉祥不仅看到东山再起有望，而且认为抗日障碍既除，团结抗战局面自应形成。25日，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实行以武力收复东北失地案”，并应汪精卫之邀来到南京。可是，南京方面并未形成冯所希望的共赴国难的局面。汪精卫“倒蒋固仍在进行，而联蒋亦为事实”，害了“政治病”。他仍幻想孙科政府能立即行动起来，“精诚团结，抗战救国”。可孙科政府很快垮台，蒋介石卷土重来。蒋假装忏悔，对冯说：“现在国难当前，我们必须精诚团结，才能挽救危亡。希望大哥随时指教”<sup>①</sup>。冯认为“介石似有真悔之意，我为国家计，仍当与之合好如初，共赴国难。”<sup>②</sup>遂产生了借重蒋恢复自己的地位，并实现抗日的幻想。“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摆出一付长期抵抗的姿态。冯认为“自赴京、沪为团结御侮奔走以来，今日总算达到了目的。”<sup>③</sup>“抗日高于一切，我们应在既定的政策之下，同

舟共济”<sup>①</sup>。

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蒋仍抱定对日妥协方针。冯失望地“离开洛阳”赴泰山，“看时局变化如何，再出而图报国耳。”<sup>②</sup>他知道要实现抗日主张，必须有实力和地盘。韩复榘虽在表面上对他很尊重，实际却认为“冯先生思想过左，他的左右都是共产党”<sup>③</sup>，颇有戒心，使他在山东开展抗日，尤其是军事活动的设想不可能实现。1932夏，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及其部下张自忠等与冯关系较深厚，冯希望能在他们的掩护下进行抗日活动，以开创个人出路和民族出路的新局面。当时，共产党根据日本侵华形势和平津、张垣长城一线聚集了许多杂牌军的情况，派人与冯商量，准备以察哈尔为组织抗日的根据地<sup>④</sup>。10月9日，冯玉祥到达张家口。当天即发出通电，抨击南京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认为“挽救国难，在于积极抵抗”，舍此别无他途。<sup>⑤</sup>这表明冯玉祥的反蒋抗日由宣传联络转向武装斗争新阶段。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爱国民众非常不满，国民党内不少人士也认为抗日必先倒蒋。在反蒋抗日目标下，原先政见不同的派别关系有所缓和，且日趋聚为一股比较强大的反蒋抗日暗流。1933年初，山海关失守，许多人士及抗日团体把目光投向冯玉祥。至4月上旬，60个以上的团体曾电促冯领导抗日。<sup>⑥</sup>他与同样有反蒋抗日要求的胡汉民、李烈钧等加强联系。1月7日，致电双方提出两个口号：“一、凡为民族独立而同情于抗日者，皆为吾友，应相互提携之。二、凡为亲日辱国以阻挠抗日者，皆为吾敌，应竭力攻击之。”<sup>⑦</sup>

南京政府不愿看到出现冯玉祥在察哈尔率军抗日的局面。王法勤等先后前来游说，望其离开张家口。冯反就军事上的抗日准备提出12条措施作为答复。<sup>⑧</sup>他告诉王法勤：“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sup>⑨</sup>3月，蒋介石到保定，请冯前去会谈。他拒绝赴保，答以5项要求：不可与日妥协；补充前方饷械弹药；抚恤伤亡；请蒋亲率大军出关收地；政治刷新与民更始。<sup>⑩</sup>4月初，冯致函蒋，坚持“对日寇拼命抵抗，用全力收复失地。”<sup>⑪</sup>5月26日，冯玉祥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通电指责“握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的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淞沪平津。”宣称“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前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

自由。”<sup>⑫</sup>

该通电实际上以反蒋抗日为宗旨，但为避免给蒋武力打击以借口，通电只是指责其不抵抗政策，要求抗日救国，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但因蒋坚持不抵抗政策，所以激烈主张武装抗日就意味着反蒋，倘若其抗日行动能得到广泛支持，便有可能重新确立其原有地位<sup>⑬</sup>。美国学者 Youli Sun 评述道：南京方面清楚，同盟军从两个方面构成了威胁。第一，它以公开的抗日行动破坏了南京的新政策，而且，公众舆论越来越不满于政府的妥协政策。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蒋的老对手冯再次控制了一支独立军队。这对蒋来说，可谓生死相关之事。所以，南京从一开始，就决心扑灭民众抗日同盟军。而且有趣的是，南京甚至与日军联合起来镇压冯军。<sup>⑭</sup>

抗日同盟军连战皆捷，各地民众极为振奋。连当年参与组织“反赤大同盟”的章太炎，针对“察哈尔赤化了”的叫嚣，称“只要能收复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们愿意赤化，我们民众愿意拥护冯玉祥先生们的这样赤化”。<sup>⑮</sup>南京国民政府始终对抗日同盟军持反对态度，准备武装攻察。正如冯玉祥旧属简又文所分析的，“冯氏处境，更为困难，既苦兵力不足，而所统之杂军，类似乌合之众，”“况且经济支绌，供养不足，军械尤缺乏，再难久持。而在军事上，则前有中央军之压迫，后有日军之进攻，益难支持，延至7月下旬，冯玉祥不得不亟筹脱身下台之善法”。<sup>⑯</sup>冯还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惟恐使宋哲元失去察哈尔这块地盘，引起旧部不满，断绝他靠旧部再起之路，故极愿宋回察主政。可是宋却“不愿在抗日倒蒋旗帜下”听他指挥。<sup>⑰</sup>无奈之下，8月6日，他通电全国，宣布即日起将察省一切军政交宋哲元办理。他本打算仍留在张家口待机再起。但蒋、汪一再促其离察入京，宋哲元也希望他离开。14日，冯玉祥离开察哈尔再赴泰山隐居。

冯玉祥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既是要抗日，也能为东山再起。东山再起的企图提供了他到察哈尔抗日的重要动力，而以反蒋抗日为重的宗旨使其此企图顺应了民众愿望，二者相辅相成造就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日局面。冯最后不得不解散同盟军，从根本上讲是他发展个人势力与救国救民双重目标矛盾激化的产物。当他意识到在重重压力面前，如果一味坚持下去，不仅对抗日大局益处不大，而且将非常不利于自己发展个人势力时，便收束军事。于是，察哈尔抗战嘎然而止。

## 二、促蒋抗日

重上泰山后，他坚持反蒋抗日。对福建事变，他有响应的准备但尚未就绪。<sup>①</sup>他希望韩复榘和宋哲元在北方响应，但都只被敷衍。他认识到依靠旧部不可能达到反蒋抗日尤其是反蒋目的。不论是为国家前途还是个人出路，都要另寻办法。

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深重的危机中。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共两党政策有所调整。这些变化，为冯玉祥寻求救国救民及个人出路提供了机遇。1935年7月20日，李烈钧来函劝冯到南京，从南京政府内部团结抗日力量，同时可以做主张抗日的在野派以及各杂牌力量的代言人。李自称这是“新的奇伟办法”。<sup>②</sup>10月19日，蒋介石邀冯晋京。冯玉祥23日复电提出奖励抗日精神，做好抗日准备等。同日，韩复榘表示愿做冯赴南京的后盾。冯玉祥是一个务实的人，很难说在失去旧部对他反蒋抗日的实际支持后，依旧有必倒蒋不可的念头。蒋很快致电接受其所提救国建议，使他感到蒋也有抗日可能，于是动身赴南京。

蒋介石表现得对冯非常尊敬，多次“请示”治国方略。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指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但又强调：“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sup>③</sup>蒋的恭敬和对日政策向积极方面的变化，更增强了冯的蒋可能抗日的判断。他决心“为国相忍”。冯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这虽有名无实，但却使他感到施展救国大计和谋求个人政治出路更有了一定基础。冯此时对蒋仍有不满，但决心“既不骂人，亦不走开”，“非促成抗日不可。”<sup>④</sup>这表明，冯玉祥已从反蒋抗日转到促蒋抗日。

冯玉祥经常致函或与蒋面谈，谈抗日之必行、抗日的准备等。他还竭力促进国民党上层的团结，数次敦请胡汉民、李宗仁等人晋京共筹国是，一致抗日。冯还一再向旧部说明蒋是要抗日的，称“中央待人以诚，必有善策与实事以慰我爱国者。”<sup>⑤</sup>希望他们服从中央。

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揭起反蒋抗日的旗帜，内战如箭在弦。冯非常焦虑，“如果开仗，定然亡国”。<sup>⑥</sup>他认为“抗日的无论如何必须大家来抗日”<sup>⑦</sup>，“国难严重至此，非在团

结中求办法，必有极大之不幸的事发生”。<sup>⑧</sup>他向两广方面表示同情，又多次拜见蒋要求停止对西南的军事行动。同时，他也向西南方面尽力说明，蒋也有抗日之意，不过二者间“对于救亡图存之骤有轻重缓急之差异”，希望他们避免与中央对立，指出：“只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得如同一家人一样，集中力量作艰苦的奋斗，才可以得到救亡图存的最后胜利。”<sup>⑨</sup>两广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主要是中日民族矛盾的作用，而冯的斡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国民党对爱国群众的抗日要求虽有所回应，但仍以高压手段压制抗日民主运动。冯玉祥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支持抗日民主运动。“七君子事件”后，冯玉祥立即参与营救行动。1936年11月26日，他致电蒋称“其设立救国会，宣传救国，立论容有偏激，其存心可为一般人所谅解。今若羁押，未免引起社会之反感，而为日人挑拨离间之口实。拟请电令释放以示宽大。”<sup>⑩</sup>但蒋介石根本不听劝告，拖至全面抗战爆发后才释放。“七君子事件”对蒋、冯而言，一个下令关，一个主张放，表明二人虽在要抗日上逐渐一致，但在如何对待民众运动问题上依然明显分歧。蒋开始注意到日军入侵的威胁，然而更看重抗日民主运动对“民国”的危害。冯把民众运动视为抗日的基础，认为不发动民众不足以抗日，并以此希望蒋有所觉悟。抗日使蒋、冯走到一起，但对民众的不同态度则预示着他们联合的暂时性和最终破裂的必然性。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这是时局转变的枢纽，解决得好，有可能迎来团结抗日的前途，否则，会使内战重新激化。冯玉祥虽无实权，难发挥大作用，但他反对使用武力，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奔走。12月13日，冯致电张学良，要求“先释介公回京”，并表示“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sup>⑪</sup>同一天又以类似内容分别致电杨虎城等，希望他们“就近维持，务以介公回京为要。”<sup>⑫</sup>13日，其夫人李德全去见宋美龄，表示愿陪她去西安。次日，他又请马相伯去“北平转西安营救之”。<sup>⑬</sup>张学良也对冯寄以厚望，14日，发电报邀请他去西安共商解决方略。从冯上述言行可知：冯同情张、杨；主张释蒋；力主和平解决，为抗日保存国防力量。他提出的和平解决要早于中国共产党<sup>⑭</sup>，对促成和平解决起了一定作用。在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冯能提出和平解决，表明了

他为实现抗日前途光明磊落的品质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及时从逼蒋抗日转到联蒋抗日，通电“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冯玉祥、宋庆龄等赞同中共的建议，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联名提出“为外患日急请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指出：“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急起直追，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外与英、法、俄、美等国进行联络，以接外援；内则全国各党各派一致团结，共同对外”。<sup>[1]</sup>在国共合作抗日谈判中，蒋介石缺乏诚意，迟迟达不成实质协议。冯一再劝说却难以发挥作用。他借回巢县老家之机，不愿再回南京，表示：“他们如不抗日，把我们弄到南京住，则无异养猪，我们若不为抗日而奋斗，则是自己把自己当猪待”。<sup>[2]</sup>全面抗战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冯如释重负，对蒋说：“只有这一件事，你办得好。”<sup>[3]</sup>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革命的主要任务也逐渐转到抗日上来。而要完成抗日大业，就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冯玉祥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为实现团结抗日而鼓与呼，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贡献。这说明，冯玉祥在这一时期顺应了历史潮流，较好地实现了谋求个人与探求国家民族出路之间的统一。

### 三、拥蒋抗日

全面抗战爆发后，冯玉祥勉励旧部“须以全力抗战”。冯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所属军队都是蒋介石的嫡系，没有谁真正听他指挥。冯向蒋抱怨：“我有两个任务，一为等死，等日本人来杀死；一为做诗。”<sup>[4]</sup>不满归不满，但他仍不遗余力地服务于抗战。在抗战初期，冯玉祥几乎每天都就抗日问题打电报给蒋介石。8月19日，他致电蒋指出：“在大沽方面，敌军纷纷增援，非窥察我津浦，即扰乱我平汉。”<sup>[5]</sup>次日，又就加强抗日外交、抗日人选、动员民众等致电蒋介石，“以备采纳”。单9月6日这一天便就抗战事宜给蒋连发三封电报（函）。

在如何争取抗战胜利问题上，国共两党存在原则分歧。两条不同的路线，反映了国共两党对抗战战争的领导权之争，这是决定抗战走向的根本问题。由于在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错，蒋一度抗战较努力，还由于对其本质认识

不清，更因冯所处的国民党高层地位，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从促蒋抗日转到了拥蒋抗日。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抗日较积极。冯玉祥深受鼓舞，希望各种力量能团结在蒋介石之下，彻底打败侵略者。1937年7月29日，冯对程潜谈到，“介石成功即为中国之成功，中国之成功即吾人之成功。”<sup>[6]</sup>11月6日，他指出要“拥护中央政府、蒋委员长，”<sup>[7]</sup>11月8日，他告诫旧属要服从蒋介石，“当国家大难之时……若对内有不平之念，则为民族敌人作工矣。”<sup>[8]</sup>作为一个有20余年军阀史，习惯于拥兵自重，惯以机会主义处世对敌的冯玉祥来说，对旧属如此谆谆教诲，其拥蒋抗日决心可见一斑。虽然冯对蒋的一些做法也有不满，但在一切服从抗日大局下他告诫自己要隐忍。甚至他所担任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一职被取消后，仍旧抱定为打败日本而拥蒋抗日的信念。在其“拥蒋抗日”中，“抗日”是目的，也是“拥蒋”的先决条件。在武汉失守前，冯玉祥对李烈钧表示：“蒋介石若抗战，我就拥护他；他若投降日本，我们就起来抗日。”<sup>[9]</sup>为抗日而拥蒋是冯玉祥拥蒋抗日思想的真谛。这实际上是对他在第二次上泰山时提出的“以抗日与否划分敌友”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

在统兵作战时，他要求士兵“作战先用子弹；子弹用完了，用刺刀；刺刀钝了，用枪头；枪头破了，用口咬。”已失去军队的冯玉祥，无刀无枪，不能直接上战场杀敌，只可实行“用口咬”——用口舌和笔墨劝蒋坚持抗战。从全面抗战爆发到胜利，他不仅每次见到蒋都要用言语劝说，而且还致函、电蒋介石数十万言。在向蒋进言时，他也知道蒋对他的意见绝大多数只是敷衍了事，甚至常引起蒋及其亲信反感。但他仍告诫自己“对抗日大计，当说的必须说，当做的必须做；做而有困难，是我做得不好，不能怪环境。”<sup>[10]</sup>他不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常说别人不能说之话，发别人不敢发之言。

1938年10月，李烈钧告诉冯玉祥，国民政府放弃武汉，蒋介石对和战问题更加动摇。他非常焦急，在得知消息后不到20分钟，便从桂林出发赴衡山见蒋。到衡山，得知蒋已到长沙，又马不停蹄驱车赴长沙。他以《三国演义》上赤壁大战前鲁肃劝孙权的话来劝蒋，即“任何人都可言和，惟主公不可。”鼓励蒋应有孙权拔剑击案自誓的决心。接着他又陈述了14条意见，包括“为适应抗战新阶段的形势，应使政府成为真正的抗日政府”，“真正做到官兵一致”，等等。<sup>[11]</sup>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屡次掀起反共高潮。在皖南事变后不久，冯给蒋写信并附诗一首《新四军何罪》，曰：“全国正抗日，自己动干戈。兄弟阋于墙，这是为什么？亲者为其痛，仇者为其乐，亲痛而仇快，必为大家祸！我劝当局者，胸怀要开阔，同心与同德，全力把敌破，自拆自己台，我看划不着。”<sup>⑤</sup>逆蒋心思而动，为抗日说别人不敢说之话，可见其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及其认识水平下，他坚持拥蒋抗日，是一个合乎实际的选择，这对他实现东山再起和抗日救国的愿望都是有利的，并顺应了历史潮流。这为他正确解决发展个人势力和救国救民的双重矛盾，最终向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前进奠定了基础。为抗日而拥蒋表明，他只是为特定目标拥蒋，一旦抗战胜利，冯玉祥就必然调整与蒋的关系，当蒋不能再满足他寻找个人出路及救国救民的双重目标时，他就可能从拥蒋转到反蒋。

冯玉祥拥蒋抗日，并非一切惟蒋是从。他在发动民众抗日、联共抗日等问题上与蒋有很大不同，并被周恩来誉为“抗战的中流砥柱。”而且，随着蒋介石在团结抗日上的逐渐反动，冯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1940年2月，蒋介石派去的宋子良在与日本人今井武夫会晤时说：“目前在重庆政府内部，反对达成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祥……对于国民党内反对派元凶冯玉祥，已准备用各种方法挫杀他的锋芒，如不得已时，考虑到用最后的强硬手段。”<sup>⑥</sup>他一度作了和蒋破裂的准备，在万不得已时跑到共产党区域去。<sup>⑦</sup>这也为冯在抗战胜利后很快与蒋介石集团决裂埋下了伏笔。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最后拥蒋抗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其思想演变的外在原因，而力图实现发展个人势力与救国救民双重目标，则是这一串复杂变化的思想动因。在这复杂变化中，包含着寻求个人出路的目的，但也有抗日救国的一面，其行为的客观后果基本上有利于民族，符合时代的要求。实际上，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大多与冯一样，都是在寻求个人及民族出路的过程中，不断协调与蒋的关系，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到拥蒋抗日。从一定意义上说，冯反蒋抗日、促蒋抗日、拥蒋抗日的曲折变化，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在“九一八”事变后到抗战胜利间，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处理抗日与蒋介石关系中的政治行为的规律性的全过程，值得深入探讨。

注释：

①②④⑥⑧⑨⑩⑫⑬⑭《冯玉祥日记》第3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55、457、488、529、580、559、558、568、571、570页。

③ 杨天石：《30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抗日潮流》，《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⑤⑦⑱《冯玉祥选集》中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52-655、694-697、766-767页。

⑪⑫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㐀㐁㐂㐃㐄㐅㐆㐇㐈㐉㐊㐋㐌㐍㐎㐏㐐㐑㐒㐓㐔㐕㐖㐗㐘㐙㐚㐛㐜㐝㐞㐟㐠㐡㐢㐣㐤㐥㐦㐧㐨㐩㐪㐫㐬㐭㐮㐯㐰㐱㐲㐳㐴㐵㐶㐷㐸㐹㐺㐻㐼㐽㐾㐿㑀㑁㑂㑃㑄㑅㑆㑇㑈㑉㑊㑋㑌㑍㑎㑏㑐㑑㑒㑓㑔㑕㑖㑗㑘㑙㑚㑛㑜㑝㑞㑟㑠㑡㑢㑣㑤㑥㑦㑧㑨㑩㑪㑫㑬㑭㑮㑯㑰㑱㑲㑳㑴㑵㑶㑷㑸㑹㑺㑻㑼㑽㑾㑿㒀㒁㒂㒃㒄㒅㒆㒇㒈㒉㒊㒋㒌㒍㒎㒏㒐㒑㒒㒓㒔㒕㒖㒗㒘㒙㒚㒛㒜㒝㒞㒟㒠㒡㒢㒣㒤㒥㒦㒧㒨㒩㒪㒫㒬㒭㒮㒯㒰㒱㒲㒳㒴㒵㒶㒷㒸㒹㒺㒻㒼㒽㒾㒿㓀㓁㓂㓃㓄㓅㓆㓇㓈㓉㓊㓋㓌㓍㓎㓏㓐㓑㓒㓓㓔㓕㓖㓗㓘㓙㓚㓛㓜㓝㓞㓟㓠㓡㓢㓣㓤㓥㓦㓧㓨㓩㓪㓫㓬㓭㓮㓯㓰㓱㓲㓳㓴㓵㓶㓷㓸㓹㓺㓻㓼㓽㓾㓿㔀㔁㔂㔃㔄㔅㔆㔇㔈㔉㔊㔋㔌㔍㔎㔏㔐㔑㔒㔓㔔㔕㔖㔗㔘㔙㔚㔛㔜㔝㔞㔟㔠㔡㔢㔣㔤㔥㔦㔧㔨㔩㔪㔫㔬㔭㔮㔯㔰㔱㔲㔳㔴㔵㔶㔷㔸㔹㔺㔻㔼㔽㔾㔿㕀㕁㕂㕃㕄㕅㕆㕇㕈㕉㕊㕋㕌㕍㕎㕏㕐㕑㕒㕓㕔㕕㕖㕗㕘㕙㕚㕛㕜㕝㕞㕟㕠㕡㕢㕣㕤㕥㕦㕧㕨㕩㕪㕫㕬㕭㕮㕯㕰㕱㕲㕳㕴㕵㕶㕷㕸㕹㕺㕻㕼㕽㕾㕿㖀㖁㖂㖃㖄㖅㖆㖇㖈㖉㖊㖋㖌㖍㖎㖏㖐㖑㖒㖓㖔㖕㖖㖗㖘㖙㖚㖛㖜㖝㖞㖟㖠㖡㖢㖣㖤㖥㖦㖧㖨㖩㖪㖫㖬㖭㖮㖯㖰㖱㖲㖳㖴㖵㖶㖷㖸㖹㖺㖻㖼㖽㖾㖿㗀㗁㗂㗃㗄㗅㗆㗇㗈㗉㗊㗋㗌㗍㗎㗏㗐㗑㗒㗓㗔㗕㗖㗗㗘㗙㗚㗛㗜㗝㗞㗟㗠㗡㗢㗣㗤㗥㗦㗧㗨㗩㗪㗫㗬㗭㗮㗯㗰㗱㗲㗳㗴㗵㗶㗷㗸㗹㗺㗻㗼㗽㗾㗿㘀㘁㘂㘃㘄㘅㘆㘇㘈㘉㘊㘋㘌㘍㘎㘏㘐㘑㘒㘓㘔㘕㘖㘗㘘㘙㘚㘛㘜㘝㘞㘟㘠㘡㘢㘣㘤㘥㘦㘧㘨㘩㘪㘫㘬㘭㘮㘯㘰㘱㘲㘳㘴㘵㘶㘷㘸㘹㘺㘻㘼㘽㘾㘿㙀㙁㙂㙃㙄㙅㙆㙇㙈㙉㙊㙋㙌㙍㙎㙏㙐㙑㙒㙓㙔㙕㙖㙗㙘㙙㙚㙛㙜㙝㙞㙟㙠㙡㙢㙣㙤㙥㙦㙧㙨㙩㙪㙫㙬㙭㙮㙯㙰㙱㙲㙳㙴㙵㙶㙷㙸㙹㙺㙻㙼㙽㙾㙿㚀㚁㚂㚃㚄㚅㚆㚇㚈㚉㚊㚋㚌㚍㚎㚏㚐㚑㚒㚓㚔㚕㚖㚗㚘㚙㚚㚛㚜㚝㚞㚟㚠㚡㚢㚣㚤㚥㚦㚧㚨㚩㚪㚫㚬㚭㚮㚯㚰㚱㚲㚳㚴㚵㚶㚷㚸㚹㚺㚻㚼㚽㚾㚿㜀㜁㜂㜃㜄㜅㜆㜇㜈㜉㜊㜋㜌㜍㜎㜏㜐㜑㜒㜓㜔㜕㜖㜗㜘㜙㜚㜛㜜㜝㜞㜟㜠㜡㜢㜣㜤㜥㜦㜧㜨㜩㜪㜫㜬㜭㜮㜯㜰㜱㜲㜳㜴㜵㜶㜷㜸㜹㜺㜻㜼㜽㜾㜿㝀㝁㝂㝃㝄㝅㝆㝇㝈㝉㝊㝋㝌㝍㝎㝏㝐㝑㝒㝓㝔㝕㝖㝗㝘㝙㝚㝛㝜㝝㝞㝟㝠㝡㝢㝣㝤㝥㝦㝧㝨㝩㝪㝫㝬㝭㝮㝯㝰㝱㝲㝳㝴㝵㝶㝷㝸㝹㝺㝻㝼㝽㝾㝿㞀㞁㞂㞃㞄㞅㞆㞇㞈㞉㞊㞋㞌㞍㞎㞏㞐㞑㞒㞓㞔㞕㞖㞗㞘㞙㞚㞛㞜㞝㞞㞟㞠㞡㞢㞣㞤㞥㞦㞧㞨㞩㞪㞫㞬㞭㞮㞯㞰㞱㞲㞳㞴㞵㞶㞷㞸㞹㞺㞻㞼㞽㞾㞿㟀㟁㟂㟃㟄㟅㟆㟇㟈㟉㟊㟋㟌㟍㟎㟏㟐㟑㟒㟓㟔㟕㟖㟗㟘㟙㟚㟛㟜㟝㟞㟟㟠㟡㟢㟣㟤㟥㟦㟧㟨㟩㟪㟫㟬㟭㟮㟯㟰㟱㟲㟳㟴㟵㟶㟷㟸㟹㟺㟻㟼㟽㟾㟿㠀㠁㠂㠃㠄㠅㠆㠇㠈㠉㠊㠋㠌㠍㠎㠏㠐㠑㠒㠓㠔㠕㠖㠗㠘㠙㠚㠛㠜㠝㠞㠟㠠㠡㠢㠣㠤㠥㠦㠧㠨㠩㠪㠫㠬㠭㠮㠯㠰㠱㠲㠳㠴㠵㠶㠷㠸㠹㠺㠻㠼㠽㠾㠿㡀㡁㡂㡃㡄㡅㡆㡇㡈㡉㡊㡋㡌㡍㡎㡏㡐㡑㡒㡓㡔㡕㡖㡗㡘㡙㡚㡛㡜㡝㡞㡟㡠㡡㡢㡣㡤㡥㡦㡧㡨㡩㡪㡫㡬㡭㡮㡯㡰㡱㡲㡳㡴㡵㡶㡷㡸㡹㡺㡻㡼㡽㡾㡿㢀㢁㢂㢃㢄㢅㢆㢇㢈㢉㢊㢋㢌㢍㢎㢏㢐㢑㢒㢓㢔㢕㢖㢗㢘㢙㢚㢛㢜㢝㢞㢟㢠㢡㢢㢣㢤㢥㢦㢧㢨㢩㢪㢫㢬㢭㢮㢯㢰㢱㢲㢳㢴㢵㢶㢷㢸㢹㢺㢻㢼㢽㢾㢿㣀㣁㣂㣃㣄㣅㣆㣇㣈㣉㣊㣋㣌㣍㣎㣏㣐㣑㣒㣓㣔㣕㣖㣗㣘㣙㣚㣛㣜㣝㣞㣟㣠㣡㣢㣣㣤㣥㣦㣧㣨㣩㣪㣫㣬㣭㣮㣯㣰㣱㣲㣳㣴㣵㣶㣷㣸㣹㣺㣻㣼㣽㣾㣿㤀㤁㤂㤃㤄㤅㤆㤇㤈㤉㤊㤋㤌㤍㤎㤏㤐㤑㤒㤓㤔㤕㤖㤗㤘㤙㤚㤛㤜㤝㤞㤟㤠㤡㤢㤣㤤㤥㤦㤧㤨㤩㤪㤫㤬㤭㤮㤯㤰㤱㤲㤳㤴㤵㤶㤷㤸㤹㤺㤻㤼㤽㤾㤿㥀㥁㥂㥃㥄㥅㥆㥇㥈㥉㥊㥋㥌㥍㥎㥏㥐㥑㥒㥓㥔㥕㥖㥗㥘㥙㥚㥛㥜㥝㥞㥟㥠㥡㥢㥣㥤㥥㥦㥧㥨㥩㥪㥫㥬㥭㥮㥯㥰㥱㥲㥳㥴㥵㥶㥷㥸㥹㥺㥻㥼㥽㥾㥿㦀㦁㦂㦃㦄㦅㦆㦇㦈㦉㦊㦋㦌㦍㦎㦏㦐㦑㦒㦓㦔㦕㦖㦗㦘㦙㦚㦛㦜㦝㦞㦟㦠㦡㦢㦣㦤㦥㦦㦧㦨㦩㦪㦫㦬㦭㦮㦯㦰㦱㦲㦳㦴㦵㦶㦷㦸㦹㦺㦻㦼㦽㦾㦿㧀㧁㧂㧃㧄㧅㧆㧇㧈㧉㧊㧋㧌㧍㧎㧏㧐㧑㧒㧓㧔㧕㧖㧗㧘㧙㧚㧛㧜㧝㧞㧟㧠㧡㧢㧣㧤㧥㧦㧧㧨㧩㧪㧫㧬㧭㧮㧯㧰㧱㧲㧳㧴㧵㧶㧷㧸㧹㧺㧻㧼㧽㧾㧿㨀㨁㨂㨃㨄㨅㨆㨇㨈㨉㨊㨋㨌㨍㨎㨏㨐㨑㨒㨓㨔㨕㨖㨗㨘㨙㨚㨛㨜㨝㨞㨟㨠㨡㨢㨣㨤㨥㨦㨧㨨㨩㨪㨫㨬㨭㨮㨯㨰㨱㨲㨳㨴㨵㨶㨷㨸㨹㨺㨻㨼㨽㨾㨿㩀㩁㩂㩃㩄㩅㩆㩇㩈㩉㩊㩋㩌㩍㩎㩏㩐㩑㩒㩓㩔㩕㩖㩗㩘㩙㩚㩛㩜㩝㩞㩟㩠㩡㩢㩣㩤㩥㩦㩧㩨㩩㩪㩫㩬㩭㩮㩯㩰㩱㩲㩳㩴㩵㩶㩷㩸㩹㩺㩻㩼㩽㩾㩿㪀㪁㪂㪃㪄㪅㪆㪇㪈㪉㪊㪋㪌㪍㪎㪏㪐㪑㪒㪓㪔㪕㪖㪗㪘㪙㪚㪛㪜㪝㪞㪟㪠㪡㪢㪣㪤㪥㪦㪧㪨㪩㪪㪫㪬㪭㪮㪯㪰㪱㪲㪳㪴㪵㪶㪷㪸㪹㪺㪻㪼㪽㪾㪿㫀㫁㫂㫃㫄㫅㫆㫇㫈㫉㫊㫋㫌㫍㫎㫏㫐㫑㫒㫓㫔㫕㫖㫗㫘㫙㫚㫛㫜㫝㫞㫟㫠㫡㫢㫣㫤㫥㫦㫧㫨㫩㫪㫫㫬㫭㫮㫯㫰㫱㫲㫳㫴㫵㫶㫷㫸㫹㫺㫻㫼㫽㫾㫿㬀㬁㬂㬃㬄㬅㬆㬇㬈㬉㬊㬋㬌㬍㬎㬏㬐㬑㬒㬓㬔㬕㬖㬗㬘㬙㬚㬛㬜㬝㬞㬟㬠㬡㬢㬣㬤㬥㬦㬧㬨㬩㬪㬫㬬㬭㬮㬯㬰㬱㬲㬳㬴㬵㬶㬷㬸㬹㬺㬻㬼㬽㬾㬿㭀㭁㭂㭃㭄㭅㭆㭇㭈㭉㭊㭋㭌㭍㭎㭏㭐㭑㭒㭓㭔㭕㭖㭗㭘㭙㭚㭛㭜㭝㭞㭟㭠㭡㭢㭣㭤㭥㭦㭧㭨㭩㭪㭫㭬㭭㭮㭯㭰㭱㭲㭳㭴㭵㭶㭷㭸㭹㭺㭻㭼㭽㭾㭿㮀㮁㮂㮃㮄㮅㮆㮇㮈㮉㮊㮋㮌㮍㮎㮏㮐㮑㮒㮓㮔㮕㮖㮗㮘㮙㮚㮛㮜㮝㮞㮟㮠㮡㮢㮣㮤㮥㮦㮧㮨㮩㮪㮫㮬㮭㮮㮯㮰㮱㮲㮳㮴㮵㮶㮷㮸㮹㮺㮻㮼㮽㮾㮿㯀㯁㯂㯃㯄㯅㯆㯇㯈㯉㯊㯋㯌㯍㯎㯏㯐㯑㯒㯓㯔㯕㯖㯗㯘㯙㯚㯛㯜㯝㯞㯟㯠㯡㯢㯣㯤㯥㯦㯧㯨㯩㯪㯫㯬㯭㯮㯯㯰㯱㯲㯳㯴㯵㯶㯷㯸㯹㯺㯻㯼㯽㯾㯿㰀㰁㰂㰃㰄㰅㰆㰇㰈㰉㰊㰋㰌㰍㰎㰏㰐㰑㰒㰓㰔㰕㰖㰗㰘㰙㰚㰛㰜㰝㰞㰟㰠㰡㰢㰣㰤㰥㰦㰧㰨㰩㰪㰫㰬㰭㰮㰯㰰㰱㰲㰳㰴㰵㰶㰷㰸㰹㰺㰻㰼㰽㰾㰿㱀㱁㱂㱃㱄㱅㱆㱇㱈㱉㱊㱋㱌㱍㱎㱏㱐㱑㱒㱓㱔㱕㱖㱗㱘㱙㱚㱛㱜㱝㱞㱟㱠㱡㱢㱣㱤㱥㱦㱧㱨㱩㱪㱫㱬㱭㱮㱯㱰㱱㱲㱳㱴㱵㱶㱷㱸㱹㱺㱻㱼㱽㱾㱿㲀㲁㲂㲃㲄㲅㲆㲇㲈㲉㲊㲋㲌㲍㲎㲏㲐㲑㲒㲓㲔㲕㲖㲗㲘㲙㲚㲛㲜㲝㲞㲟㲠㲡㲢㲣㲤㲥㲦㲧㲨㲩㲪㲫㲬㲭㲮㲯㲰㲱㲲㲳㲴㲵㲶㲷㲸㲹㲺㲻㲼㲽㲾㲿㳀㳁㳂㳃㳄㳅㳆㳇㳈㳉㳊㳋㳌㳍㳎㳏㳐㳑㳒㳓㳔㳕㳖㳗㳘㳙㳚㳛㳜㳝㳞㳟㳠㳡㳢㳣㳤㳥㳦㳧㳨㳩㳪㳫㳬㳭㳮㳯㳰㳱㳲㳳㳴㳵㳶㳷㳸㳹㳺㳻㳼㳽㳾㳿㴀㴁㴂㴃㴄㴅㴆㴇㴈㴉㴊㴋㴌㴍㴎㴏㴐㴑㴒㴓㴔㴕㴖㴗㴘㴙㴚㴛㴜㴝㴞㴟㴠㴡㴢㴣㴤㴥㴦㴧㴨㴩㴪㴫㴬㴭㴮㴯㴰㴱㴲㴳㴴㴵㴶㴷㴸㴹㴺㴻㴼㴽㴾㴿㵀㵁㵂㵃㵄㵅㵆㵇㵈㵉㵊㵋㵌㵍㵎㵏㵐㵑㵒㵓㵔㵕㵖㵗㵘㵙㵚㵛㵜㵝㵞㵟㵠㵡㵢㵣㵤㵥㵦㵧㵨㵩㵪㵫㵬㵭㵮㵯㵰㵱㵲㵳㵴㵵㵶㵷㵸㵹㵺㵻㵼㵽㵾㵿㶀㶁㶂㶃㶄㶅㶆㶇㶈㶉㶊㶋㶌㶍㶎㶏㶐㶑㶒㶓㶔㶕㶖㶗㶘㶙㶚㶛㶜㶝㶞㶟㶠㶡㶢㶣㶤㶥㶦㶧㶨㶩㶪㶫㶬㶭㶮㶯㶰㶱㶲㶳㶴㶵㶶㶷㶸㶹㶺㶻㶼㶽㶾㶿㷀㷁㷂㷃㷄㷅㷆㷇㷈㷉㷊㷋㷌㷍㷎㷏㷐㷑㷒㷓㷔㷕㷖㷗㷘㷙㷚㷛㷜㷝㷞㷟㷠㷡㷢㷣㷤㷥㷦㷧㷨㷩㷪㷫㷬㷭㷮㷯㷰㷱㷲㷳㷴㷵㷶㷷㷸㷹㷺㷻㷼㷽㷾㷿㸀㸁㸂㸃㸄㸅㸆㸇㸈㸉㸊㸋㸌㸍㸎㸏㸐㸑㸒㸓㸔㸕㸖㸗㸘㸙㸚㸛㸜㸝㸞㸟㸠㸡㸢㸣㸤㸥㸦㸧㸨㸩㸪㸫㸬㸭㸮㸯㸰㸱㸲㸳㸴㸵㸶㸷㸸㸹㸺㸻㸼㸽㸾㸿㹀㹁㹂㹃㹄㹅㹆㹇㹈㹉㹊㹋㹌㹍㹎㹏㹐㹑㹒㹓㹔㹕㹖㹗㹘㹙㹚㹛㹜㹝㹞㹟㹠㹡㹢㹣㹤㹥㹦㹧㹨㹩㹪㹫㹬㹭㹮㹯㹰㹱㹲㹳㹴㹵㹶㹷㹸㹹㹺㹻㹼㹽㹾㹿㺀㺁㺂㺃㺄㺅㺆㺇㺈㺉㺊㺋㺌㺍㺎㺏㺐㺑㺒㺓㺔㺕㺖㺗㺘㺙㺚㺛㺜㺝㺞㺟㺠㺡㺢㺣㺤㺥㺦㺧㺨㺩㺪㺫㺬㺭㺮㺯㺰㺱㺲㺳㺴㺵㺶㺷㺸㺹㺺㺻㺼㺽㺾㺿㻀㻁㻂㻃㻄㻅㻆㻇㻈㻉㻊㻋㻌㻍㻎㻏㻐㻑㻒㻓㻔㻕㻖㻗㻘㻙㻚㻛㻜㻝㻞㻟㻠㻡㻢㻣㻤㻥㻦㻧㻨㻩㻪㻫㻬㻭㻮㻯㻰㻱㻲㻳㻴㻵㻶㻷㻸㻹㻺㻻㻼㻽㻾㻿㼀㼁㼂㼃㼄㼅㼆㼇㼈㼉㼊㼋㼌㼍㼎㼏㼐㼑㼒㼓㼔㼕㼖㼗㼘㼙㼚㼛㼜㼝㼞㼟㼠㼡㼢㼣㼤㼥㼦㼧㼨㼩㼪㼫㼬㼭㼮㼯㼰㼱㼲㼳㼴㼵㼶㼷㼸㼹㼺㼻㼼㼽㼾㼿㽀㽁㽂㽃㽄㽅㽆㽇㽈㽉㽊㽋㽌㽍㽎㽏㽐㽑㽒㽓㽔㽕㽖㽗㽘㽙㽚㽛㽜㽝㽞㽟㽠㽡㽢㽣㽤㽥㽦㽧㽨㽩㽪㽫㽬㽭㽮㽯㽰㽱㽲㽳㽴㽵㽶㽷㽸㽹㽺㽻㽼㽽㽾㽿㿀㿁㿂㿃㿄㿅㿆㿇㿈㿉㿊㿋㿌㿍㿎㿏㿐㿑㿒㿓㿔㿕㿖㿗㿘㿙㿚㿛㿜㿝㿞㿟㿠㿡㿢㿣㿤㿥㿦㿧㿨㿩㿪㿫㿬㿭㿮㿯㿰㿱㿲㿳㿴㿵㿶㿷㿸㿹㿺㿻㿼㿽㿾㿿

(责任编辑 张卫东)